

房地產挾持了中國經濟

郭之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近日表示，房地產佔到GDP的6.6%和投資的14%，直接相關產業達60個，已成為中國經濟的直接命脈。2010年內地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將對中國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

不適合作支柱產業

不由想起經濟學家易憲容於2004年7月發出的那個引起了很大反響的警告：「謹防房地產業挾持整個中國經濟」。當時他便明確指出，房地產業已經把地方政府、國家經濟及民衆利益綁綁在一起，要挾著整個中國經濟。他以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為例，提醒房地產一出現問題，將使整個經濟很快進入衰退期。從此余斌的分析看，大約可以說，易憲容在5年前已「不幸而言中」。

有幾個離不開的支柱產業或曰「命脈產業」，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並不令人意外。但許多地方的經驗已經證明，將房地產業作為經濟支柱產業恰恰是非常不合適、不安全的。與其他產業如製造、旅遊等產業相比，房地產業具有封閉、內向、流動性差等特點。某地的樓市攀升再高也難以拿到別的地方出售。在此基礎上的GDP增長多數都難逃「數字遊戲」的嫌疑。而且，房地產價格過高，更是會直接影響當地人們在別的地方的消費，影響到普遍的幸福指數。如易憲容所言，當房地產成為被「挾」的高消費，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經濟增長肯定是並非理性的。

高房價將衝擊社會

尤應注意到的是，房地產業所挾持的，不僅是經濟發展，更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普遍的人際關係模式、道德認知水平、職業理想追求等都已經受到高房價的深刻影響。比如最近電視劇《蝸居》熱播，這部兼具房奴、二奶和官場貪腐等要素的電視劇，已經成爲一樁不折不扣的公共事件，無數人因爲劇中情節生發對現實的感慨。在關於《蝸居》的網絡論壇(百度貼吧)中，「職業二奶」郭海藻的命運是一個絕對的熱點，不少人同情她，更有許多人羨慕她甚至表示要追隨她。這顯然可以視作道德認知的滑坡，即便這種滑坡是被現實逼出來的。對於一個社會的理性、文明等而言，這又是一種何等尷尬的局面？

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蝸居》之熱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目前房地產長期畸熱之下的必然。但是，如果一個產業的發展，讓許多的人不得不去犧牲尊嚴、出賣感情、屈從於金錢和權勢、尋找不到幸福感、社會道德認知也被其扭曲，這一產業的發展還有其道德理性的基礎嗎？由此來看，房地產業成爲中國經濟的直接命脈，至少在目前是十分可悲的事情。

見死「拖」救

管祖煌

近日，一篇「人心的醜陋，這樣『爲人民服務的警察』」的帖子在騰訊、網易等網站論壇上傳播。發帖者稱，浙江省富陽市有民警在搜救溺水女孩前，追問「住址在哪」、「電話號碼多少」等問題，拖延救援時間，使女童溺亡。一直以「有求必應、有難必幫、有險必救」爲追求目標的人民警察，爲何在「人命關天」的大是大非面前，出了錯、越了軌？這中間的深層原因，到底是什麼？縱觀此事件全過程，不難發現，事出主要有三因：

其一，「職業病症」之慣性。誠然，平時出警到現場取證，特別是詢問當事人或訊問嫌疑人，問錄姓名、住址、電話、職業等「前六項」，是諸程序中的第一環節。可在生死攸關的救援現場，竟然做起「刻板文章」。如此不分輕重緩急、機械地走程序的「職業病」，應是導致女童溺亡的因素之一。

其二，「依賴思維」在作怪。在公安內部雖有多警種之分，但對外都是「有險必救」的人民警察，在搶險解難中還有什麼你我之分？儘管女童母親等人苦苦哀求，他們還是無動於衷，一味強調要等漁政、水警，而拒絕施救。此等「分工即分家」的思想，是不是導致女童溺亡的因素之一？

其三，「民本理念」被異化。「立警爲公、執法爲民」是公安工作的宗旨。可富陽警方卻把「人民警察爲人民」寫在紙上、貼在牆上、喊在嘴上，就是落實不到人民最需要的緊要關頭。甚至還以「有人打撈可以不入水」、「不是所有人都要等著民警去救」等荒唐之言，回答民衆質疑。這種「口號式」的爲民服務理念，不能不認爲是女童溺亡的根本因素！

資本主義具「反世貿性」

陳群

當今世界，「世貿神話」同「市場神話」一樣，都取得了全球性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反世貿性」是一貫的。不可迷信「自由貿易」、WTO等神話，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同時，最重要的是開創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最近，有兩個關於「世貿」的消息值得一提：一是在11月8日至15日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奧巴馬等各國領袖，都闡述了反對貿易保護的主張；二是11月17日奧巴馬訪華，美媒體出現一種輿論：「中美間的貿易磨擦是一種常態，中國應學會適應」。長期以來，美、歐限制中國出口「輪胎」、「鋼管」、「紡織品」等WTO案，說明即使在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的「反世貿性」仍表現得十分突出。筆者以爲，貿易保護是違反WTO的，並非應「中國學會適應」，而應是「美國學會改變」。當今世界，99%的觀點認爲資本主義是「自由貿易的樣板」。這類「世貿神話」同「市場神話」一樣，都取得了全球性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反世貿性」是一貫的。

世界有過「自由貿易」嗎？

按當今世界主流經濟學觀點，市場經濟是以「自由貿易」爲特徵的。但博爾尼、布羅代爾研究了全球經濟貿易史後得出相反的結論：不單是一國或一地區的內部市場交易從來「不具備完全的自性質」，而且國際市場也從來一樣。所謂「自由貿易」，不過是「自由主義經濟信奉者一廂情願的想像而已」。

回顧全球貿易史，「自由貿易」只是「偶發性特例」，而「貿易保護」才是常態。貝羅奇以「世貿教條的發源地」——歐洲爲例。在19、20世紀這200年中，貿易「相對自由」的時間不過50年，而另外150年，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天下。貝羅奇證明了一個有趣現象：1890年到1913年歐洲經濟增長最快，卻是「貿易保護主義」全盛時期；相反，1870年到1890年「貿易最自由時期」，正是歐洲「經濟大衰退時期」。美國情況亦然，1870年到1914年，工業增長極爲迅速，但採取的卻是「極高的關稅」。相反，20世紀70年代，關稅大幅降低，經濟卻大幅下降，這正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歷史原因。同樣，日本9大商社佔全國進出口總額50%以上，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等，從「誘導性工業政策」到「出入口補貼」，從「獎勵性信貸」到「價格管制」，從「稅收」到「關稅」，「貿易保護」大大勝於「貿易自由」。當今在WTO上一直存在「是」與「非」兩派觀點，原因

恰在此處。以美國爲例，19世紀以來，美國關稅率之高在發達國家位列前茅，在Smoot Hawley關稅法案實施後的1932年，美國關稅率更上升至59%的新高。雖說此後不斷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降至4.8%，但其「非關稅保護措施」卻大幅提高，如「自願出口限制」、「多纖維協定」等。歐洲的例子前面已經提到，那麼東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如何呢？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等的對外貿易，從來也不是「自由放任的貿易」，戰後這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外貿大幅增長」，基本是「政府種種補貼獎勵政策」所致，並非WTO規則所致。當然，我們也可以舉出另一種案例：反觀經濟相對落後地區，如拉美、南亞、非洲、東南亞等地區，由於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其19至20世紀的貿易政策比歐美要「自由」得多，但這卻是一種「被迫」的「自由貿易」，不僅未給欠發達地區帶來經濟社會發展，反而使它們陷入殖民經濟的深淵。

美國成了「反世貿」典型

現代資本主義給人以主張「自由貿易」的印象，從來不是真正想與別國「自由貿易」，而不過是取得了「經濟強勁」之後的「不平等競爭」。美國里根政府造成的世貿障礙，比其他工業國家高出3倍；克林頓時期口頭大講「自由貿易」，但壓迫墨西哥簽署「不再低價出口西紅柿到美國」的「城下之盟」，直至近日美國對華「輪胎案」的貿易保護……不勝枚舉。美國一位政府發言人講得很坦率：「我們不會完全聽從世貿所定的任何規則，也不會允許世貿強迫我們改變國內的法律」。這段話，代表了現代資本主義「反世貿」的典型立場。

必須肯定的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不參與國際經濟競爭是不行的，不與WTO打交道也是不行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加入了WTO就指望現代資本主義會「忠實遵守」WTO規則，就像我們也同樣不能要求

自己不抗爭一樣。因爲，對本國的貿易保護與在WTO的鬥爭中取得最大利益，才是世貿的本質特徵。

開創自己的發展道路

筆者認爲，WTO在本質上只是一套規管國際貿易的機制，是一套由經濟主宰者和經濟學教條推導出來的理想化規則，而與現實世界的「貿易是否自由」並無必然聯繫。世界貿易史證明，對於資本主義來說，只有當它們的經濟競爭實力足以稱雄世界，或其關貿保護主義足以使任何外貿規則不讓自己吃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贊同「自由貿易政策」，才會大力鼓吹「自由貿易論調」。不爭的事實是，任何國際規則，包括WTO，都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唯我獨尊的本質特徵。

筆者以爲，迄今的世貿史還證明，在過去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貿易競爭中，真正的「成功者」從來是少受市場規則或世貿規則約束的國家、集團或商人，而真正的「失敗者」，則是那些在各種競爭中，受到種種約束的弱勢國家或企業。

要認清資本主義的「反世貿性」，絕不是否定「參與WTO競爭」，而是要打破一種神話——WTO等規則，從來不是「免費的午餐」，更不是發展中國家「理想的階梯」，只是我們「順勢的選擇」。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迷信「自由貿易」、WTO等神話，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同時，最重要的是開創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作者爲資深評論員



重啓六方會談關鍵看美國

就任美國總統近一年時間後，奧巴馬終於在其亞洲之行的韓國站就朝核問題的解決作出了正式決定，那就是

指派美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博斯沃思於12月8日訪問朝鮮。較之於對巴阿問題、以巴問題、伊拉克問題等各類極難解決的複雜事態的密切關注，奧巴馬拖至今日才對相對容易解決的朝核問題給予重視，已凸顯出其政策選擇與中國的顯著差別。情況很清楚，在對各類問題的解決方面，中國一直遵循「先易後難」的原則。但不管怎麼說，奧巴馬能因爲各種因素的影響而決定開啓美朝對話，還是應能對重啓六方會談產生積極效應的。

毫無疑問，雖然人們還無法判定即將推展的博斯沃思的朝鮮之行將取得怎樣成果，但根據朝鮮曾作出的「美朝對話是重啓六方會談的先決條件」來判斷，則似乎可以得出相關六方重談談判桌的前景只是時間問題的結論。然而，儘管重啓六方會談的障礙已經不復存在，儘管半島情勢呈現峰迴路轉的良好態勢，甚至可令遲滯已久的六方會談有可能盡快得到重啓，但如果不能準確探詢會經取得有益成效的六方會談於瞬間崩潰的根源，那麼，即便六方會談如人們所期待那樣實現了重啓，而該機制會否再度受挫，則還是會成未定之數。

應以半島無核化爲首選

筆者之所以總是對六方會談的未來前景感到疑慮，顯然是源自相關各方對未來走向有完全不同的追尋目標所致。不錯，李明博在新聞會上強調了他的「大交易」方案獲得奧巴馬認同的共識性結論（其實，奧巴馬將其稱之爲「大妥協方案」），並且以「應通過六方會談實現完全、可驗證的棄核」的前提條件來作爲會談基礎。當然，爲了促朝棄核，美韓雙方還以400億美元的大量援助和安全保障的承諾來作爲催化劑。但問題是，如果朝鮮做到了「完全、可驗證的棄核」，而美韓雙方的相關承諾卻並不兌現，結果又將如何呢？人們必須意識到，在對立雙方的各種實力處於不對稱的情況下，要求弱勢一方首先讓步而強勢一方靜等結果，則幾乎不可能得到對方的認同和接受。

由此也就構成了一個最核心的實質性疑問，即國際社會是認同「邪惡軸心」的判定而希望將朝鮮搞垮呢？還是期待通過和平談判的途徑而促使朝鮮棄核並實現東北亞的穩定與繁榮呢？如果是後者，朝核問題就根本不存在無法破解的深厚癥結。事實上，六方會談曾經取得積極成果便是最好明證。相反，倘使是前者，也就意味著六方會談已毫無意義。事態很清楚，如果半島無核化根在美國的戰略規劃之中，金正日在此背景下重回六方會談，不是要自動成爲或被變換的對象嗎？

強勢一方首先作出妥協

毫無疑問，美韓戰略動向是朝棄核的誘因。其實，如果撇開龐雜情境而直入實際主題，內容應該很簡單，那就是，弱勢一方應該能夠獲得安全保障，而強勢一方則應該能夠對其核動向實行嚴密監控。具體而言便是，美日韓三國盡快與朝鮮簽定和平協議並通過另外五方爲朝鮮提供經濟援助，而朝鮮則必須將其所有核活動完全擯棄。毫無疑問，早有論者得出過朝鮮不可信任的結論，而在筆者看來，如果得到如此優厚條件的朝鮮依舊不能放棄其核動向，那麼，整個國際社會就此原委而對其採取軍事行動，不更是師出有名嗎？情況很清楚，如果筆者的主張能被各國採納，則不僅是對朝鮮誠信的考驗，恐怕更是對這些國家智慧的實際檢閱。

人們必須意識到，奧巴馬是因爲「無核武世界論」而獲取諾貝爾和平獎的，這也就應該令防核擴散成爲國際社會的共同依歸。坦率而言，倘使某國因爲棄核而令自己政權崩潰，那麼，「無核武世界論」就會淪爲歷史的笑柄。正因爲奧巴馬宣導「無核武世界論」並因此而獲諾貝爾和平獎，他的所有政策都應該以防核擴散爲首要選項，而決不可以介入相關核國家的意識形態範疇。事實上，該選項不應局限於朝鮮，而必須牽涉所有具核動向國家。

歷史經驗表明，解決相關問題的最恰當方式應該是，強勢一方首先作出妥協而靜待弱勢一方作出回應，這更能達到「有理有利有節」的境界。思想開放的美韓雙方何樂而不爲呢？

邱波



現年59歲的袁益中是全北京爲數不多的幾位能製作傳統建築重要部分「料拱」的人。11月25日，他將精心製作的「西四牌樓」運往北京國際展覽中心。

韓中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大韓民國駐港總領事 石東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主席率領長征期間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們一同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布新中國成立，那是改變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重要時刻。六十年後的同一天，同一地點，身着中山裝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出發走過169步後，緩緩升起了五星紅旗。這是一個莊嚴的儀式，象徵着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所經歷的一百六十九年艱難歷程和復興歲月，象徵着中國人民繼續開創美好未來的豪情壯志。

天安門廣場上整齊劃一的閱兵式結束後，中國自行研發的洲際彈道導彈各種尖端武器也都一一亮相，盛大的國慶閱兵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威武。緊隨其後的是莊嚴而熱烈的彩車及群眾遊行隊伍，中國人民爲他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歡呼雀躍。回顧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所走過的艱辛歲月，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中國人如此情緒高昂、感慨萬分了。被稱爲「東亞病夫」的舊中國的一百多年是一段屈辱和傷心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之後，也不是一帆風順，接連遭遇了二十年左右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困難時期。

中國已經躍升

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後，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領導下，隨着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中國這才真正開始飛速發展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一九七八年開始的三十年裡，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8%。一九七八年的年出口額僅爲200億美元，如今

每年超過1.4萬億美元。農村貧困人口也從原來的2.5億銳減到1400萬。二〇〇八北京奧運會的完美舉辦和神舟七號載人飛船的成功發射，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尖端科技水平。

目前中國持有高達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經濟規模和貿易額已位居世界第三。中國正由世界工廠成功轉型爲世界市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發揮着世界經濟復蘇的引擎作用。無論是在氣候變化、金融危機以及其他全球性經濟問題上，還是在國際政治、安全問題上，中國都積極參與。如今的中國已躍升爲外交大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中國擺手謙讓，但我們實際上生活在由中國和美國共同引領世界的G2時代。

遠親不如近鄰

不久前，我訪問了中國最小也是最不發達的寧夏自治區。當我看到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上拔地而起的大型能源化學工業基地時，腦海中立刻浮現出碧海桑田，不禁想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今年年初，在香港亞洲協會的演講中，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提到，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十年裡，出訪過外國的中國人只有20萬人次，可知每年就達4200萬人次，以此來強調中國的巨大變化。中國再也不是停滯不前的落後國家，如今的中國已變得日新月異、活力四射。這不由自主的讓我想起了在與中國持續數年交流的韓國人的心目中，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中國有句俗話「遠親不如近鄰」，韓中兩國地理位置相鄰、歷史相通、文化也十分相近。經受過殖民地統治屈辱的韓國，對中國有着同病相憐的切身感受。新中國成立後的六十年間，中國克服重重

困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此，作爲近鄰，韓國人由衷的表示祝賀和欽佩。同樣，在過去的六十餘年裡，韓國也戰勝困難，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取得了公認的成績，成就了漢江奇蹟。

改革開放政策給中國帶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韓中關係的發展。一九九二年兩國正式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所取得的巨大發展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代表性的成功事例。去年韓中貿易額達到1683億美元，幾乎等於韓國與日本、美國貿易額的總和。韓國在華投資高達440億美元，中國已成爲韓國最大的海外投資國。兩國的人員交流每年也已超過500萬人次，6.7萬名韓國留學生在中國學習，佔整個在華留學生總數的30%；在韓國也有6.3萬名中國留學生，佔整個在韓留學生總數的77%。他們將是今後韓中關係繼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後備力量。

兩國攜手共進

兩國在外交、安全領域的相互合作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以去年五月韓國總統李明博訪華爲契機，韓中兩國的關係已提升爲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兩國在G20首腦會議上發揮着主導作用。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也進行着合作，雙方合作的領域不斷擴大和深化。

過去六十年裡，韓中兩國都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和讚賞，兩國人民都由衷的感到自豪。事實證明，韓國和韓國的輝煌發展向來都是爲對方提供了良好的機遇，還使我們互相學習，在良性競爭中尋求共贏。雖然在韓中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也伴隨着挑戰，但我們堅信會共同迎接挑戰並使兩國關係更加趨於成熟。正如中國的一句話「信松茂而柏悅」，衷心祝願韓中兩國作爲友好鄰邦攜手共進，繼續開來，共創美好的未來！